



卢森堡評傳

弗雷德·厄斯納著

孔固、李度譯 林穗芳校

卢森堡評傳

弗雷德·厄斯納著

孔固 李度 譯

林穗芳 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四年·北京

Fred Oelßner
Rosa Luxemburg
Eine kritische biographische Skizze
Dietz Verlag
Berlin, 1952
根据德國柏林迪茨出版社1952年版书譯

卢森堡評傳

〔德〕弗雷德·厄斯納著
孔固、李度譯
林穗芳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4\frac{3}{4}$ · 插頁 2 · 字數 122,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650 定價（七）0.65元

統一書號 11002·382



Rosa Luxemburg



統一書號：11002·382

定 价： 0.65 元

(AZS/09)

目 录

第一部分 战斗的一生

在故乡的童年·····	1
流亡中的研究时期·····	5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11
关于組織問題的討論·····	19
第一次俄国革命·····	23
俄国革命的教訓·····	27
理論工作·····	39
选举制斗争与群众罢工·····	49
波兰的与俄国的工人运动問題·····	59
反对战争和軍国主义的斗争·····	63
帝国主义战争·····	74
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	86
德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	91
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建立·····	99
惨遭敌人凶杀·····	104

第二部分 一个錯誤的体系

(卢森堡主义)

历史根源·····	111
哲学观·····	114
經濟概念·····	118
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	133
自发論·····	144

第一部分 战斗的一生

在故乡的童年

罗莎·卢森堡生于一八七一年三月五日，她的誕生地是札莫斯，是当时俄国統治下波兰卢布林地方的一个小城市。罗莎·卢森堡的生年在有些傳記之中，說成是一八七〇年。若干对于她的生年的詳細研究，到如今还没有得出一个精确的結論，不过从有关方面的許多证据看来，罗莎·卢森堡本人是以一八七一年三月五日，作为她誕生的年月日的。

罗莎·卢森堡的父亲是一个犹太商人。她的父亲与当时波兰小城市中大多数的犹太人不同，他不仅克服了犹太区和正統犹太人信仰的狹隘性，而且还傾向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家庭里他們所說的不是在东欧犹太人中非常流行的“犹太話”，而是波兰話。她的母亲是一个細心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妇人，她对于她的孩子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罗莎·卢森堡是五个孩子中最年幼的。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得过腰痛病，因此她曾整整一年不能离开床褥。这种病給她的一生带来許多害处。从身材上看来，她是矮小的，但是她非常的活潑和聰明。她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經能够讀書和写字。

罗莎·卢森堡出生后不到几年，她的家庭就迁移到华沙去了。她的家庭处于不稳定的小康状态之中，时常有物质上的严重困难来侵扰他們。如尤利安·馬尔赫列夫斯基所报导的，他們为了需要几个卢布来維持家庭生活，有时甚至于不得不把臥床都送到当鋪里去。罗莎說过，有一次她用了一張紙票来点油灯，這張紙票是她家最后的一張錢币，是她父亲費了力气賺来的。但是她的父亲并不因之而責怪她，而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談論这支昂貴的火柴来

安慰她。这一点正足以表示她的家庭气氛的特色。她家的这种气氛，对于这个小女孩的发展来说，是影响很大的。在她的家庭中，尽管时常发生物质上的严重困难，但并不因之充满沮丧、失望的情绪。她的父母是醉心于文化生活的，所以也引导自己的孩子们向这一方面去寻求乐趣。她的家庭里充满了真正崇拜席勒的气氛。罗莎·卢森堡对于波兰的伟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特别感到衷心的爱慕。她爱好诗歌韵文学，并且自己还写诗歌。德国皇帝威廉第一在一八八四年访问华沙的时候，她就写了一首已经带有政治色彩的讽刺诗。她用下列的话来结束这首诗：

只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亲爱的威廉：
告诉你那狡猾的家伙俾斯麦，
替欧洲做这件事吧，西方的皇帝，
命令他，不要玷污了“和平的裤子”。

另一件轶事说明罗莎·卢森堡在她年轻的时候，对于诗歌艺术感到何等深厚的兴趣。一八九二年她受苏黎世波兰流亡者组织的委托，写一本《迎接一八九二年五月一日》的小册子。但是，这本小册子不可能发表出来，因为她不是以散文形式写成的，而是以诗的形式写成的！

卢森堡的父亲尽了一切的努力使他的孩子们尽可能受到最好的学校教育。华沙第一女子中学对于罗莎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因为这个学校只给俄国上层的统治阶层的女孩子以入学的权利。虽然华沙第二女子中学只招收极少数的犹太女孩子，但是罗莎竟能如愿以偿，进了这个学校。她是全校所有各班中最小的学生，但也是最好的学生。当时在学校里严格禁止使用波兰国语。由于老师们顽固地执行这个禁令，所以引起了学生们的抗议。当然罗莎·卢森堡是属于这个学生反对派的。因此她就不能不遭到第一次政治上的牺牲。虽然她获得了成绩优异的毕业证书，虽然她可以获得一般的金质奖章，然而因为她对政府的对立态度，所以

失去了获得奖章的机会。

罗莎·卢森堡十五岁在中学毕业之后，立即参加了当时遍布俄国和波兰的一个地下組織，因此就与革命的工人运动发生了关系。一八八二年波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产生，就是以这个地下組織和罢工救济基金会为基础的^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党是一个站在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立场上的政党。这个政党教导群众說：波兰人民的解放只有在与俄国革命运动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胜利。这个政党进行了广大的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最突出的是：六千名紡織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一八八三年二月紡織厂的女工們为反对华沙警察局对她们进行像对待妓女似的卫生检查而举行的抗議运动，这次抗議成功了。此外还有一八八五年三月失业工人在华沙行宮前廣場上所举行的强大的示威游行。“无产阶级党”于一八八四年与俄国革命党即民意党（民粹派）訂立了战斗同盟。一八八四年到一八八五年間无产阶级党被沙皇警察粉碎了，党的領袖們或者被絞杀了，或者被送到彼得堡附近的臭名昭彰的石虑塞堡堡壘終身监禁了。

当罗莎·卢森堡加入运动的时候，“无产阶级党”只剩下了一些小的組織。在这样的一个小組織里，她开始熟悉“无产阶级党”所出版的进步的政治文献，由于組織工作的媒介，她認識了一九〇五年遭到沙皇劊子手屠杀的波兰卓越的工人革命家馬丁·喀司波尔扎克。不久警察终于发觉这个組織的綫索。因为罗莎·卢森堡的同志們要她避免监禁或放逐的危險，于是她不得不逃亡到国外。

还不到十八岁的罗莎·卢森堡就秘密地越过了波兰的边境。波兰同志們如何地重視这位女战士，从下面一个事实中就可以得到证明：組織她这一次逃亡的不是別人，就是馬丁·喀司波尔扎克本人。在准备她逃亡的工作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因为无法用走私的方式把罗莎·卢森堡送出波兰边境，所以馬丁·喀司

^① 罢工救济基金会的任务，是在于組織罢工以及創立一种自由捐助的罢工基金。罢工救济基金会是职工联合会的前身。

波尔札克就以她拟在外国受宗教洗礼为理由，求助于一位天主教神父。起初这位神父还怀疑罗莎·卢森堡可能由于恋爱关系而想改换宗教。直到罗莎·卢森堡向他提出她的改换宗教完全是出于信仰基督教的保证之后，这位神父才答应给她帮助。罗莎·卢森堡乘农人的车子，藏在稻草下面越过了边境。

有一本关于罗莎·卢森堡的传记认为从她在学校内的反抗态度开始以至走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是命运（！）所注定的。这个玄虚的胡说的理由是这样的：当时俄国的情况对于罗莎·卢森堡曾有过三重压迫，因为“她是被沙皇束缚的俄国人民团体中的一员，她是被外族征服的波兰人民中的一员，她是被蹂躏的犹太种族中的一员”。这一切真是非常的荒谬。第一，大家知道，革命的社会主义不是从沙皇压迫中产生出来，而是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西欧接受过来的，而且它是在列宁领导之下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工人运动不是由压迫，而主要是由大工业发展而产生的；第二，大家知道，对波兰人民的镇压引起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如下面将要指出来的，罗莎·卢森堡对于波兰民族主义是那样深恶痛绝，致使她对于民族问题永远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看法；第三，犹太“种族”（？）之受压迫引起了犹太的民族运动。对这个运动，罗莎·卢森堡则完全不感到兴趣。关于这一点可以作为说明的，是她死前两年写给她的友人的一封信。一九一七年初，罗莎·卢森堡从乌克兰监狱给麦特希尔德·伍尔姆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你对于犹太人特别感到痛苦？对于我来说，普度迈耶橡胶园中可怜的牺牲者，躯体给欧洲人当球玩的非洲黑人，是同样的亲近。你还知道伟大的总参谋部的著作中关于喀拉哈里地方的托罗哈什战役的一些话么？……‘濒于死亡的人的断气呻吟，饥渴欲死的人的惨痛呼号，在崇高的漫无边际的寂静中消逝了’。呵，这个‘崇高的漫无边际的寂静’，这里面不知还有多少呼声寂寂无闻地消逝了。这种寂静这样强有力地打动我的心脏，因此在我内心之中实在没有对于犹太人感到特别痛苦的余地；我觉得在整个世界上凡是有云彩、

有飞禽、有人的泪痕的地方，都如同在家乡一样。”^①

罗莎·卢森堡在学校内的叛逆态度（以及在父母家庭内所受的影响）可能推动她走向革命社会主义。但是决定她走这条道路的则是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与革命工人运动的结合。

流亡中的研究时期

罗莎·卢森堡到苏黎世去，以便在那里进行她的研究工作。这个城市是当时俄国和波兰流亡者的中心。所以她不久就会见了其中最卓越的代表如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魏腊·查苏利奇。一八九〇年列·约基赫斯也来到苏黎世，罗莎·卢森堡与他们相遇不久，就成了深交，他们中间的友谊一直到她逝世才告终止。

罗莎·卢森堡在苏黎世寄居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者吕贝克的家中。吕贝克因有麻痹病而不能离开床褥，所以连写字都不可能。因此他想通过写作来维持全家的简单生活也就格外地感到困难了。吕贝克太太原是波兰人，她所有的精力都消耗于料理家务和照顾许多孩子上。当罗莎·卢森堡与他们认识的时候，在他们家庭之内已充满了没落的绝望情绪。罗莎立刻给他们的家庭以道义上的支持。她对于他们不能有很多物质上的帮助：因为她本人在这方面也是很少办法的。但是她用这个方法来帮助吕贝克的家庭：她把吕贝克的口述写成论文，大概她自己也为他写作；此外她还协助吕贝克太太料理家务，主要的帮助是她使他们的整个家庭在精神方面重新振作起来。以后罗莎·卢森堡为了自己获得德国国籍，曾与吕贝克的一个儿子进行伪婚。这个伪婚于一九〇三年春天即解除了。

罗莎·卢森堡在大学里最初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因为她对于植物界和动物界感到特殊的兴趣。她这样的兴趣一生没有改变

^① 卢森堡：《致友人书》，汉堡一九五〇年版，第四八—四九页。

过。就是在她死前几年，世界大战期间，她在牢狱里的时候，还是热心地进行植物学的分析，以及乐于将动物界作为观察的对象。这些工作常常给她的牢狱生活带来安慰。在她的《狱中书简》中还遗留了许多关于动物的著述，这些著述是珍贵的文献的一部分。

但是她的深厚感情和敏锐理智，促使她为解放多灾多难的生物——人而斗争。因此她不久就转到社会科学，研究国民经济学。她的老师尤里乌斯·沃尔夫，是一个自命博学的反动的德国教授的典型。罗莎对于他的学说的研究较之对于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特别是对卡尔·马克思的研究，要少得多。免不了会有这样的事情：她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不久就远远超过她的老师，她能在课堂讨论中与她的老师大开其玩笑。虽然关于尤里乌斯·沃尔夫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值得报导，但是他承认了罗莎·卢森堡的卓越能力以及将她从他的学生当中提拔出来，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倒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尤里乌斯·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些在大学里不易于见到的事情。在大学里我除了完全地继续从事讲授生涯以外，还指导了我在苏黎世时候一个天资最高的学生罗莎·卢森堡的学术研究。她从波兰和俄国来到我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她是在我这里考取政治科学博士学位的（她的卓越的论文以波兰的工业发展为题目）……”^①。

在苏黎世时，罗莎·卢森堡与其他的流亡者，特别是约基赫斯，继续进行波兰工人运动的工作。她深入地研究了波兰的历史和经济发展，这个研究工作的成果，就是她的《波兰的工业发展》一书。从罗莎·卢森堡看来，这个研究绝不是一个抽象理论的事情，而是以指出波兰工人运动的道路为目的的。

八十年代末，波兰工人运动开始了新的高涨。“无产阶级党”改组了，同时它在群众中的工作也加强了。许许多多的作为职工

^① 《现代经济学》，佛·曼纳博士编，来比锡一九二四年版，《尤里乌斯·沃尔夫自传》，第一二页。

会的先驅者的工厂工人互助儲蓄会也产生了。

新的組織也成立了，这就是波兰“工人联盟”。它主要的是注意經濟問題，它也进行經濟斗爭和进行一定的馬克思主义宣傳。一八九三年在波兰王国境内成立了波兰社会主义党。这个党是以爭取波兰独立作为党的綱領的主要之点。

在流亡中的、特別是在倫敦和巴黎流亡中的、过去已經与“无产阶级党”有联系的波兰知識分子集团，在波兰社会主义党成立以前，已經創立了“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这个集团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創造了一个独特的波兰“民族社会主义”。波兰“民族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无产阶级党”已經認識到俄国革命是波兰工人运动的主要同盟者，而这些流亡者对于俄国革命却失掉了信心。他們宣称在俄国人民当中并不存在革命力量，因此他們主張波兰工人运动首先必須为波兰从俄国分离出来而努力，必須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而斗爭，然后才能在这个国家之内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这种見解从其内核看来，包含了整个民族主义的变种。一九〇六年以后它使波兰社会主义党为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參謀部服务，后来，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九年期間，它甚至使一部分以前的波兰社会主义党首領充当波兰毕尔苏斯基法西斯政权的旗手。

“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的民族主义流派，在它的波兰的党組織内，就遇到坚强的反抗。这些流亡者向波兰分发的关于“民族社会主义”路綫的宣傳品，华沙、罗茲和多姆布罗娃矿区的工人們不仅沒有将它傳播，而且将它燒毀了。在瑞士反对这个社会沙文主义的发言人，就是以罗莎·卢森堡、列·約基赫斯和馬尔赫列夫斯基—卡爾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主义者集团。这个集团創辦了一个名为《工人事业》的刊物。这个刊物在波兰社会主义工人中获得非常的好評。罗莎·卢森堡領導了这个刊物的編輯部。她以馬克思主义的路綫来对抗民族主义的路綫。

她反对民族主义的路綫是从这样一个論点上出发的：就是波

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俄国、德国和奥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致的。因此波兰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于联合俄国、德国和奥国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只有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普遍的革命，才能解放包括波兰人民在内的人民大众。只要资本主义体系存在，就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因此波兰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为一个波兰独立而斗争，而是为反对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斗争。

显而易见的，罗莎·卢森堡当时阐述的反对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民族主义的路线，对于民族斗争对整个无产阶级的意义作了过低估计。假如她所反对的民族主义，只是后来波兰社会主义党人的民族主义，则罗莎·卢森堡是完全对的。列宁再三地给这些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点的人们，打了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烙印。把波兰独立的斗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特殊阶段的口号，是和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相对立的，是和与俄国革命联盟相对立的；罗莎·卢森堡反对这个口号，她也是对的。但是她拒绝了民族自决权的口号，那罗莎·卢森堡就错了。因为这个口号是任何真正的民主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因之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因此列宁与斯大林从他们革命活动开始，就不断地宣传这个口号。承认这个口号，就等于承认每个民族有选择适合它的国家组织形式的权利。但是每个民族的自决权利，决不是如波兰社会主义党人所说的那样，是带有强迫性的。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之下，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必须创立一个独立国家。因为罗莎·卢森堡接受了波兰社会主义党人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自决权的解释，所以她反对民族自决权本身，而不是反对波兰社会主义党人对民族自决权所作的民族主义的歪曲，所以她就不自觉地走向了那个主张压迫波兰人民的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路线。她不理解民族问题的意义是由于从她一开始革命活动就采取了这样一个错误的立场。她对于这个问题的不理解，终生也未能克服。虽然罗莎·卢森堡的动机是反对民族主义，但是这改变不了她的观点的原则

性的錯誤。

一九一三年，当列宁总结二十年爭論的时候写道：“罗莎·卢森堡的荒謬可笑的錯誤的基本点正是在于：‘人們由于害怕帮助被压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却帮助了压迫民族的不仅是資產階級的而且是反动的民族主义。’由于这一点她好久以前既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被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三年八月）所嘲笑。”^①

波兰工人运动路綫的斗争，也被轉移到国际戰場上去了。在国际戰場上民族主义派的随从者，居然将这个斗争从原則性辯論的高度引到下流的阴谋和誹謗的泥潭中。一八九三年在苏黎世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国外联盟”，即民族主义派，派了九位代表参加。在社会民主党方面，則是由一些年輕的，国际上还不知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卡爾斯基（馬尔赫列夫斯基）和罗莎·卢森堡在內，組成代表团。这些民族主义者对于这一个代表团，激烈地展开誹謗性的攻击。他們甚至于怀疑罗莎·卢森堡是警察的間諜。因为民族主义者都是一些为人所“公认”的首領以及与社会主义者国际的著名首領如普列汉諾夫有密切关系，所以他們能够在大会上否决了罗莎·卢森堡的代表資格。

同民族主义者的爭論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之后就引起波兰社会主义党內部的分裂。許多属于这个党的波兰組織就脱离了民族主义的政党，同时創立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罗莎·卢森堡与列·約基赫斯担任了它的领导工作。社会民主党的許多組織也加入了这个新党，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所謂波兰王国的东北部地区（特别是格罗德諾和維尔納）的波兰工人的組織，因此这个党的名称就扩大为“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卓越的革命家菲利克斯，捷尔仁斯基也随着这些組織而加入了。

民族主义的波兰社会主义党的首領們于一八九六年在倫敦召开的下一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企图再次施展其无耻的伎

^① 《列宁全集》，第十七卷，苏黎世一九二九年版，第一四四——一四五頁。

俩。它的首領达欽斯基誣蔑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們为流氓，为公开的匪徒。但是这次徒劳无功，罗莎·卢森堡的代表資格被大会通过了。一八九六年倫敦代表大会必須把波兰解放运动的基本問題——民族問題也加以討論。罗莎·卢森堡在同一年之内，在《新时代》发表了两篇表明她的立場的主要的論文。在这两篇論文里，她批判了波兰社会主义党对于民族問題的立場，她說道：波兰脱离俄国以及波兰独立是一种反动的口号，这等于努力把波兰与俄国在經濟上融合这个不可避免的經濟发展过程加以阻止。罗莎·卢森堡当时就已經对于民族运动作了过低估計，这从下面的話就可以看出来：“社会发展的明显趋势已經造成了一种結果，就是現在波兰沒有一个社会階級对波兰复兴感到兴趣，同时具有力量使这种兴趣发生实际作用”^①。卡尔·考茨基在名为《波兰完了么？》这篇論文中駁斥了罗莎·卢森堡这个見解。他在这篇論文中指出波兰独立的口号是为反对俄国沙皇专制制度而提出的，是与俄国革命胜利联系在一起。卡尔·考茨基还正确地指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危險性，就在于由于害怕小資产階級民族主义而去冒更大的危險：去关心波兰的压迫者和俄国沙皇制度的事情^②。

罗莎·卢森堡完全正确地見到：波兰大資本家和大地主与沙皇締結了和約，并把波兰独立看作是一个不現實的梦想。但是她不想正視：繼續不断地加强的民族压迫，使广大的小資产階級、农民階級和一部分資产階級以及广大的青年群众成为反对沙皇制度的最激烈的民族的反对派。她也不想正視：由于民族的压迫，民族解放的口号本身得到一部分工人階級的响应。她的拒絕民族自决权的錯誤立場，这就是說：她的使无产階級放棄領導民族解放斗争的錯誤立場，实际上一定会造成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先鋒队与由于民族的压迫而迫切地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大众之間的疏远，一定会导致資产階級的民族主义者对人民大众的統治。

① 《新时代》第十四年度（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第二卷，第四六六頁。

② 同上，第四八四——四九一頁和第五一三——五二五頁。

一八九六年倫敦国际代表大会对于这个爭論問題作了決議。这个決議的內容是这样的：“大会表明它贊成一切民族的完全自决权，对現在每一个遭受軍事的、民族的或其他压迫的国家的工人表示同情。它要求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們加入全世界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队伍，从而与他們共同地为消灭国际資本主义而斗争，为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①

这个決議既意味着希望把波兰独立的要求列入国际綱領中的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失敗，也意味着反对所有民族自决权的罗莎·卢森堡的失敗。当时卡尔·考茨基最詳尽發揮过的第三集团的观点被接受了。它的基本論点是这样的：“一方面对于一切民族完全自决权的絕對直接的、不容許歪曲的解釋表示承认，另一方面向工人們提出参加他們階級斗争的国际統一戰綫这个同样明确的要求。”^②

罗莎·卢森堡并不因这个失敗而放棄她的立場，她还用下列的說法来挽救她的站不住脚的观点：她认为这个決議的重点在于它的第二部分……以后的发展指明了坚持这个錯誤观点的后果，是怎样的严重！

波兰民族主义者在一九〇〇年举行的下一次国际會議上，又企图针对罗莎·卢森堡进行誣蔑性的攻击。但是他們这一次的举动，只能給人以嘲笑的口实而已。

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一八九七年罗莎·卢森堡以优秀成績从大学毕业了，并且得到法学博士学位。接着她就迁移到德国，目的是为了在波森和西里西亚的波兰工人里面，合法地进行革命工作。她在这方面的的工作，特别是以促进这个区域内的波兰工人与德国工人之間的阶

^① 轉引自《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七九頁。

^② 同上，第五八一頁。